

研究論文

話語偏見與面子協商：關於汶川地震報導的跨文化分析

單波、劉學

摘要

西方媒體的汶川地震報導在整個話語結構上依然呈現着群體間話語偏見，中國主流媒體把西方媒體的報導「轉述」成正面報導，顯然是剝離了語境的選擇性解讀，這種選擇性解讀呈現了群體間話語偏見的另一種面相，即在表達內群體時，總是選擇與自我群體認同一致的他者話語以維護群體的面子。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關係中進行，必須感知他者話語的具體語境、上下文結構、文化價值、意識形態，這一方面可以解構由刻板印象所主導的話語，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文化開放的語境中認知自我，建構自我形象。

關鍵詞：汶川地震報導、面子協商、話語偏見、西方傳媒

單波，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比較新聞學、跨文化傳播。電郵：shanbo@whu.edu.cn

劉學，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比較新聞學。

電郵：medialixue@gmail.com

Discourse Bias & Face-negotiation: Analysis of Intercultural Coverage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SHAN Bo

LIU Xue

Abstract

Western media coverage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still demonstrates inter-group bias at the discourse level; therefore, when Chinese mainstream media relay the Western reports as positive,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is given out of context. Such selective interpretation has revealed another kind of discourse bias: discourses of others consistent with the in-group are always chosen for in-group expression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group face. Defending self-image and seeking approval of others must be carried out in relations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of the specific linguistic and non-linguistic context, cultural values, and ideology of others. In so doing, stereotype-dominant discourses may be deconstructed on one hand and identity may be constructed in the open context on the other.

Keywords: coverage of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face-negotiation, discourse bias, western media

四川汶川大地震震動中國，剛剛實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接受了第一次重大挑戰。還沒有完全適應信息公開制度的中國各級政府在走向信息公開的過程中面對災難、組織抗災，讓巨大的創傷在人類「手拉手」的合作精神中得以救治。西方傳媒在多樣性的話語呈現中把中國在災難信息發布、新聞報導方面表現出來的開放作為一個側面報導。這一報導側面所產生的直觀效應是，中國主流媒體充滿欣喜之情，認為西方媒體高度評價中國政府和媒體在地震中的表現，中國網民對西方傳媒的怒火也大幅度下降，就連專事揭露西方媒體偏見的anti-cnn網站也很少出現揭露西方媒體地震報導偏見的帖子。那麼，這是不是意味着中西方互動關係的某種戲劇性轉變呢？

有關新聞媒介與刻板印象的實驗研究表明，關於他者的刻板印象彌漫在西方主流媒介之中，而刻板印象以巧妙而高度有效的方式延續於西方文化之中 (Devine and Elliot, 1995; Gorham, 2006)。本文的研究發現，西方媒體的汶川地震報導與拉薩騷亂事件報導相比，減少了完全的負面報導，增加了平衡呈現的策略，但在整個話語結構上依然呈現着群體間話語偏見；中國主流媒體把西方媒體的報導「轉述」成正面報導，顯然是剝離了語境的選擇性解讀，這種選擇性解讀呈現了群體間話語偏見的另一種面相，即在表達內群體時，總是選擇與自我群體認同一致的他者話語以維護群體的面子。我們所要面對的問題是，西方媒體的話語偏見是如何產生的？面對他者的偏見，如何在對話中維護自我群體的面子？

分析路徑：群體間話語偏見與「面子協商」理論

根據奧爾波特 (G. W. Allport) 的觀點，語言可以微妙地反映人們的思維結構，特別是在內群體對待外群體的時候，我們可以從語言中看到內群體對外群體的刻板印象或對內群體的偏愛 (Allport, 1954)。安妮·馬斯等人 (Maass, Salvi, Arcuri & Semin, 1989) 循此提出群體間語言偏見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理論，認為在群體間交往的語境下，當遇到與關涉內—外群體的預設觀念不一致的信息時，語言的使用體現着刻板印象的痕迹。當描述一個內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或外群體成

員的消極行為時，人們往往使用更為抽象的語言；而當提起內群體成員的消極行為或外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時，人們則使用更加具體的語言。這一理論的基礎在於語言的抽象程度 (abstractness of the language) 理論 (Semin & Fiedler, 1988)，即語言的抽象水平從低到高依次為：最為具體的描述性行為動詞 (Descriptive Action Verbs, DAVs)、解釋性行為動詞 (Interpretive Action Verbs, IAVs)、狀態動詞 (State Verbs, SVs) 和最為抽象的形容詞 (Adjectives, Adjs)；抽象的語言描寫着從具體的可觀察到的行為中高度抽象出來的性情和持久的狀態，如誠實、創造性、信念和嫉妒等；具體語言描述着具體的、可觀察到的、有始有終的行為，如親吻、拜訪、幫助和威脅等。這種語言現象在群體交往中隱含着很深的玄機。比如，甲揮起拳頭打乙，可以用四種不同抽象水平的表達方式來描述：第一，甲打乙。「打」這個描述性行為動詞，是在特定情境下對特定行為的客觀描述，沒有積極或消極的內涵意義。第二，甲將乙打傷。雖仍特指某個特定情境下的特定行為，但在描述之餘提供了加工和解釋，使其在語義上具有消極的內涵意義。第三，甲憎恨乙。「憎恨」是沒有動作的起始和終結的狀態動詞，它在描述以外提供了闡釋。第四，甲有攻擊性。「有攻擊性的」隱含着相對穩定的性情特質。這種特質除體現在當前的時間和情境下外，還可泛化至其他時間、與其他人际交往的情境，因而具有刻板印象的特徵。如果甲是內群體的成員，人們往往會用具體的語言表達這一消極行為，而如果甲是外群體的成員，人們則往往會使用抽象的語言表達這一消極行為，這便是群體間語言偏見。它揭示出這樣的事實：既存的群體間偏見致使帶有偏見的語言廣泛使用，而帶有偏見的語言又維繫着既存的偏見。

有兩種機制促成了群體間語言偏見 (Maass, Ceccarelli & Rudin, 1996)，一是動機機制，即人們都有保護內群體的動機 (ingroup protective motive)，而群體間語言偏見恰恰強化或保護了人們的社會認同。具體語言可以將行為與行為人區別開來，而抽象語言則習焉不察地體現着行為人穩定而持久的性情特質。故而，群體間語言偏見是一種稱許內群體，貶損外群體，從而維護內群體形象的做法。二是認知機制，即與期待不一致的行為相比，描述與自己期待一致的行為時，人

們更傾向於使用抽象的語言。究其原因，與期待一致的行為凸顯出穩定性和典型性，使用相對穩定的抽象語言進行描述更殊為合適。事實上，人們對內群體成員和外群體成員持有不同的期待。人們更期待內群體的積極行為而不是消極行為。與此同時，與內群體成員相比，人們更易以外群體成員的消極行為推斷其消極的性情特質，而他們的積極行為卻難以與其性情特質構成必然聯繫。此時，為了把外群體的積極行為與刻板印象協調起來，人們會使用具體的語言來表述外群體的積極行為。其原因在於，雖然人們會感知到外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但刻板印象會使他們認為外群體表現出消極行為的概率更大，於是，他們常常將非典型的積極行為與外群體一般行為區分開來，或將一個單獨的行為從外群體的衆多行為中剝離開來，以維護刻板印象的一致性。因此，與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一致的行為常常被視為一個特例，認為這種特別的積極行為與情境相關，且轉瞬即逝，而這一心理機制則以相應的群體間語言偏見的形式得以顯現，即與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一致的行為（外群體的積極行為）以具體的語言來描述。

但是，有一種情況被群體間語言偏見理論忽略了：人們有時也會使用抽象語言表達外群體成員的積極行為，而且這種抽象語言所表達的積極意義符合外群體的自我認同，如果不做完整的話語分析，我們常常會忽略隱含於語境、敘述結構與意義結構中的話語偏見，從而形成「偽溝通」。其實，任何語言所表達的積極意義或消極意義都不是抽象的、固定的，而是存在於具體的語境、上下文結構、文化價值、意識形態之中，僅僅只做語言的抽象程度理解是不夠的。另一方面，在對話過程中，人們還會突出或放大他者對「我們」的行為的積極表述，模糊或遮蔽他者對「我們」的行為的消極表述，從而形成維護內群體形象的話語與他者話語的競爭關係。這樣，對內外群體的表達的偏見，並不止於語言的抽象和具體、積極和消極，而要進一步考察是否從特定群體的話語框架進行表達而使話語呈現某種偏向。這就要求我們建構群體間話語偏見的分析路徑，假定人們在表述外群體時，總是習慣於把對外群體行為的理解納入自己的話語框架，在積極與消極意義上都形成了由刻板印象所主導的理解。

進一步地，群體間交往是一個社會性的互動過程，群體間話語偏

見所呈現的消極意義和積極意義不是由語言和話語界定的，而是在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的過程中生產的，或者說是在群體間的「面子協商」(face-negotiation)中流動的。按照丁允珠的「面子協商」理論，「面子是個人的自我在某種關係情境中呈現出來的形象」，也是「個體期望他人給予自我社會價值認同的一種需求感」(Ting-Toomey, 1988)，它是在某一情境下進行互動者互相界定的身份。每一種文化群體的成員都會為他們想要擁有的面子，而與外群體成員互動、協商。「面子」有消極的和積極的兩類。隸屬於「高語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的東方文化成員崇尚集體需求和目標，將它置於個體需求和目標之上，這種群體價值導向的文化，追求積極的面子，即「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所謂「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極高的價值，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所謂「給面子」是鼓勵支持並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隸屬於「低語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西方文化強調個體的價值、需求、目標均高於群體，這種個體價值導向的文化追求消極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以及「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義為「消極」或「被動」性的，是因為這類面子，主要作用是維護自我的最起碼的尊嚴，不具有對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這一理論實際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眾形象)是個體在群體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號資源。這種符號資源，深刻地聯繫着個體的心靈——人格結構、關於安全和恐懼的潛意識(消極面子)，還深刻地聯繫着人與人之間建立的權力支配關係、禮儀交換關係(積極面子)。根據這一理論我們可以假設：從自我面子出發定義他者，必定會產生話語偏見，要想進入與他者的面子協商，只有去體驗他者的面子。

但是，這一理論又存在明顯的缺陷：過於簡化東西方文化的特點，而忽略了東西方文化的豐富性和變化性；過於強調東西方文化面子觀的二元對立(群體價值導向和個體價值導向)，而沒能注意兩種面子觀的相互交叉與相互借用，以及由此可能形成的共同面子和新的面子；雖然丁允珠後來意識到有必要對面子中感情的作用、環境因素的影響和面子如何改變等問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Ting-Toomey & Chung,

2005)，但這一理論還是顯得偏重定型化的面子，而忽視了語境化的面子協商，這樣就難以動態地、全面地理解多樣化的面子協商。為此，我們必須進一步關注，面子協商是在關係中展開的，隨着面子觀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借用，自我認同會發生多樣性的變化，某些變化會形成新的面子和主體間的共同面子，我們可以以此反思舊有的群體間話語偏見。當媒介在內外群體關係範疇內表達新聞事件時，代表不同群體的媒介間的互動就會演繹出群體間話語偏見和面子協商，而且具有典型的反思意義。

西方地震報導：積極與消極意義的呈現

現代建構主義認知心理學發現，人們總是根據過去的經驗和受社會文化意識的影響而形成的一定的框架來認識、解釋外在世界 (Berger & Luckmann, 1967; Goffman, 1974)。新聞記者也通過框架生產新聞話語，包括依一定框架以快速處理大量信息 (Gitlin, 1980)。框架作為組織新聞成篇的中心觀念或者情節，它賦予新聞所報導的事實以意義，是完理解西方傳媒汶川地震報導的話語結構的重要路徑。由此，本文通過分析四家英美報紙地震報導的事實選擇、意見表達和文句修辭等方面的策略，來呈現西方媒體報導汶川地震所採用的意義生成系統——報導框架，從而展現西方媒體地震報導的真相。

為了展現西方媒體報導地震的真實情況，本文抽取四份有代表性的報紙進行文本分析：美國自由派的主流報紙《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保守派的重要報紙《芝加哥論壇報》(*Chicago Tribune*)，英國保守派主流報紙《泰晤士報》(*Times*)、左派報紙《衛報》(*Guardian*)。這四份報紙各自在美國和英國具有很強的影響力，而且分別代表了左和右兩方面的立場。本文選取新聞的時間段是地震發生後的一個月，即5月13日到6月13日。之所以選取這段時間，是因為6月13日，對災區人民威脅最大的唐家山堰塞湖導流已取得穩定勝利，意味着自然災害的威脅基本解除。而且，6月13日前後也是官方確認「抗震救災鬥爭已取得了重大階段性勝利」的時間。在這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共刊

發新聞34條、評論2篇，《芝加哥論壇報》共刊發新聞40條、評論1篇，《泰晤士報》共刊發新聞38條、評論空缺，《衛報》共刊發新聞34條、評論9篇。總計146條新聞、評論12篇。

雖然這四家報紙在其國內政治立場上有差別，但是在報導中國地震時它們所採用的報導框架卻有很大的一致性，而且這四家報紙報導的數量也沒有太大差異。唯一比較顯著的差別表現在評論方面。《紐約時報》、《芝加哥論壇報》的評論數量少，均主要關注中國在地震救援期間的開放局勢之後民主政治的走向。而《衛報》的評論大大多於其它報紙，且意見更加多元。《衛報》9篇評論中有6篇同時還論及緬甸熱帶風暴災害，在比較中展現中國地震救援不同於緬甸的做法，同時也對西方的災難救助政策進行了反思，¹對西方媒體過度報導中國災民而忽視緬甸災民的做法提出了批評。²《衛報》的評論還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心理進行了反思，指出應正視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變化。³但是《衛報》的9篇評論的基調仍然是西方民主政治的觀念，它也沒有影響到《衛報》在新聞報導中所採用的報導框架。四家報紙所呈現的基本一致的報導框架可以表述為以下五個層面：

第一，強震肆虐中國，中國人的奮力救援。

地震發生之後第二天(13日)，四家報紙在初次報導的12條新聞中，大部分着力於災情與救災報導。其核心標題是：「強震肆虐中國，數千人死亡」；「地震肆虐中國：數千人死亡，建築垮塌埋住兒童；毀損物阻礙救援」；「地震襲擊中國，數千人死亡」；「中國地震數千人死亡」。在後續的報導中，新聞內容涉及餘震和堰塞湖的威脅、倖存者所經歷的痛苦、災民的生活狀況等方面。核心話語包括：

「救援人員今早奮力(struggle to)前往救助災民。」⁴

「數千救援人員整夜在爛泥和滑坡體中徒步跋涉，全力挺進群山裏的震中。所有的道路都被毀或者受損嚴重。履帶挖掘機(treaded tank)被用來穿過那些艱險的地帶。直升機因為壞天氣而返航。」⁵

「軍隊急速前往(rush to)開挖導流渠，在洪水淹沒山谷之前疏導湖水」；「在下游，官員急速前往(rush to)可能的洪水將要經過的區

域疏散人群。」「在唐家山堰塞湖，數百士兵二十四小時不停 (work around the clock) 挖掘渠道，以便在湖水翻越壩頂之前疏導湖水。」⁶

「在有些地方，沒有充足的電力來保存屍體。除了快速埋葬，別無選擇。」⁷

「在體育場，趕來的災民領到食物和毛毯，並接受基本的醫療服務。但是周三中午，人群膨脹得太龐大，在體育館前門拿着擴音喇叭的官員不得不阻止新到災民的進入。」⁸

「張元奎 (音) 埋葬亡妻之後，堅強地開始農活自救。他說，『我們還活着，我們能用我們的雙手來重建家園。』張元奎也說到要依靠政府，但是並非消極地等待，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對政府的期望」。⁹

在這裏，表達救災行為的積極意義的語言 (effort, try to, rush to, struggle to) 是限定在具體的災情 (massive damage, devastated, trapped, knocking down, kill) 之中的，很自然地將非典型的積極行為與對於外群體的刻板印象區分開來，而又不影響刻板印象的一致性，也不影響轉向消極意義的表達。

第二，在與緬甸風暴災難的對比中展開評價。

災情和救災報導最初所呈現的語境常常是緬甸風暴災難，因而形成積極評價。例如：「相對活躍的信息流動和最高領導層的快速反應與中國在唐山地震中的表現完全不同，也與緬甸處理氣旋災難完全不同。」¹⁰ 中國與緬甸政府面對災難的「頑固反應完全不一樣」，「中國政府快速有效的反應應得到讚揚」。¹¹ 「就官方反應來說，看上去官方表現不錯，不像緬甸。他們已經說了，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救人，而且已經呼籲國際援助。」¹² 而且還有報導對中國拒絕外國人力援助的說法進行了比較客觀的解讀，指出中國政府不接受外國人力支援「不是因為國防機密，而是基於中國現在已有足夠的人力和經驗這樣一種現實判斷」。¹³ 從這個層面開始，積極意義被限定在具體的背景之中。

第三，中國地震期間的開放和積極有效救災是為奧運會營造良好

氛圍、緩和國際關係的臨時策略。四家報紙形成了這樣的典型話語：中國為準備奧運會而高度重視自身形象，因此會盡力避免像緬甸那樣冷酷拒絕外援所激起的國際上的批評；¹⁴「中國的領導人知道，北京奧運會只剩下不到90天，它不再能承受對國際或者國內聲望的再次打擊」；¹⁵「中國把災難救助視為促進與鄰國關係的策略和在8月的北京奧運之前緩解其國際形象的策略」；¹⁶「中國政府全力準備8月的北京奧運，已經疲於應付西部藏區普遍出現的騷亂。因此地震快速反應的壓力特別強烈。」¹⁷此時，積極意義開始向消極意義轉化。

第四，把地震災害表達為社會主義制度終結的意象。

《芝加哥論壇報》甚至直接把標題寫成：「對中國(政治)基礎的震動」。¹⁸報導首先說，如果是在中國的古代，「中國的人民會問，這些驚人的災難，特別是一場可能造成五萬人死亡的地震，是否可能昭示着共產黨(政權)失去了古代中國所稱的『天命』——更高權力的政治授權。」報導還通過對災民的描述試圖表達專制統治在人民身上刻下的影子：

…「溫家寶都流淚了」，高文凱(音)用充滿敬畏的聲音說。這個61歲的農民站在他的侄兒的商店裏，他的侄兒的女兒也在數百個被垮塌的校舍壓死的學生之中。「我們將依靠政府」，這樣的期望在四川重災區十分普遍，就像反復吟誦的歌曲。這不僅僅是人們走投無路的絕望反應，它還是半個世紀以來(要人民)依賴共產黨的政治訓練的結果。

「政府是我們的巨大安慰。如果領導人沒有來，那麼我們就永遠也不會重新安頓下來，它帶給我們安寧」，60歲的農民媽媽王永京(音)說。她的房子差不多被夷平。她說話的地方與地震時900個學生正在上課的那個學校距離很近。只有數十個學生獲救。

《衛報》以相對隱晦的語言展現了這種影子：「夫妻倆沒有水，食物也不多，他們說。他們除了讚揚(政府)救災的努力，也沒有事情做。」¹⁹《芝加哥論壇報》5月24日的報導²⁰用專家話語說明「中國仍基本是政府主導和控制的社會」。《紐約時報》5月14日的新聞²¹認為，

「如果中國應對一場大的自然災難比美國應對卡特拉颶風更加成功，這個成就就可能證明了北京的觀點：它的非意識形態的新威權主義可以在快速經濟增長的同時形成好的統治。」那麼政府的救災和開放是因為，「可能政府已經意識到開放和責任可以加強它的正當性並澆滅腐敗、通貨膨脹和貧富懸殊所激起的日益強烈的憤怒」。《紐約時報》5月21日的報導²²再次給出解釋：「國際社會強烈反對中國鎮壓藏族之後，中國領導人想用地震來顯示他們的威權政府在關鍵時刻能夠負責，甚至是平民主義的。」在這裏，表述已轉向高度抽象的政治話語，積極意義喪失殆盡。

第五，質疑開放和負責是否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改變，是否將是一個長期的轉變。5月24日的《泰晤士報》便發出疑問：「中國的新貌、開放能否持續到浩大的救災之後？」它是否是一種「根本性改變的信號」。²³《紐約時報》在5月14日似乎就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一個短暫的開放和負責並不意味着中國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發展。」²⁴《泰晤士報》也在5月17日的報導中指出，「中國政府仍然保持獨裁、完全不民主。」這些懷疑與判斷把西方媒體的民主政治敘述框架直截了當地表達了出來。而中國的正面進步之所以受到西方媒體的肯定和讚揚，也是因為中國的做法是在向西方民主靠攏。比如在讚揚溫家寶總理親臨災區指導救災、親民愛民的時候，新聞總結道：「溫家寶的舉動像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家。」²⁵

西方媒體的民主政治框架還通過兩個事件的報導得以呈現，第一是校舍倒塌造成大量學生死亡以及由此引發的學生家長抗議事件，第二是志願者和全民捐助所體現的市民社會的發展。校舍倒塌及家長抗議屬於中國視野中的典型負面新聞。前者的核心話語是：地震是天災也是人禍。後者一方面呈現出中國志願者的救災活動和普通中國人的慷慨捐助，「地震催生了過去不曾見的志願者大軍」，²⁶「形成活躍的市民社會被認為是中國更加民主化的重要一步。一些(非政府組織)倡導者希望地震成為激勵公眾推動更多(政治)變化的一個決定性的時刻。」²⁷另一方面又試圖說明，「政府容忍一個更強的市民社會是有限度的。雖然很多主要的國際救援組織最初被允許進入災區，但是對它們的活動的控制已經收緊」。²⁸

中國政府在地震初期對新聞報導的開放姿態讓西方記者吃了一驚。《泰晤士報》5月13日報導，²⁹「中國統治者的地震反應突出了他們從不當處理近幾年的危機中學到的教訓。這一次，沒有迹象顯示他們試圖像2003年SARS危機那樣捂住災難，那一次保密催生了流言和恐慌。」《紐約時報》在〈地震新聞不受審查〉的單篇報導中也對中國媒體的開放報導表示驚異：「母親在他們孩子的身體上痛哭。救援人員在建築廢墟中攀爬。一臉嚴肅的政治領導人安慰受災人員並恢復嚴重受傷的國家的信心。這些景象在世界多數地方都是災難的主要內容。但是中國電視上不間斷播出的救災畫面卻很不一般，因為中國在歷史上掩蓋自然災害的損壞程度並反應笨拙。」³⁰《衛報》5月17日的報導³¹肯定了中國災區對外國記者開放：「西方記者在震中周圍順利通過警察的檢查點，這與10年前長江洪水淹死數千中國居民時的中國做法形成鮮明對照。」《泰晤士報》5月24日的報導³²認為，災情和救災的報導「在中國前所未有」，「執政的共產黨……願意讓人民獲悉充分的災情信息也不同尋常」。《泰晤士報》5月26日的報導³³則指出，溫家寶總理對待西方媒體的態度，「帶來的滿是驚喜」。

但是，隨着事件的發展，西方媒體對中國的信息開放又轉向懷疑。《泰晤士報》5月24日的報導³⁴這樣表達了疑問：「面對罕見的災難允許罕見的開放對中國統治者來說已經相對容易。他們可以自信的是報導會依單綫進行。現在的問題是他們是否會允許相反的報導和真正的表達自由。」在同一天，《衛報》的新聞³⁵發現，「中國媒體繼續地毯式報導地震，儘管報導控制變嚴了」。西方媒體不久就發現，中國真的在重新收緊對新聞的控制。《芝加哥論壇報》5月22日報導，³⁶「中國退回形象控制狀態：控制新聞報導」。報導記述了控制的表現：「三天全國哀悼日的最後一天，共產黨政府回歸傳統方法來實施它的威權。面對逆境的團結的口號醒目地出現在國家媒體和什邡重災區的街道上。市中心商業街的告示牌顯示着地震破壞的照片，包括倒塌的建築和受傷的人。一個巨型標語寫道：萬眾一心。」在地震中後期，外國記者在採訪抗議的家長時也被驅離。³⁷5月21日，《紐約時報》報導「媒體控制在收緊」。³⁸《紐約時報》6月2日的新聞報導，「6月1日家長抗議的活動中國媒體一律不報導」。³⁹6月10日，《衛報》報導，「在一段相對的

開放之後，媒介控制也在收緊」。⁴⁰ 6月13日的《衛報》新聞報導，「都江堰和巨源的封鎖隨媒體控制的收緊而來，國內記者被指示集中報導救災的正面新聞，外國記者被拒絕進入災區。」「都江堰和巨源禁止外國記者進入，至少7個外國記者在過去一周被警察短暫扣留。其他外國記者在檢查站被攔下。」報導認為，「控制是一個倒退……控制反映了一種政治擔憂：被毀的學校可能成為反政府情緒的聚焦點」。⁴¹

上述話語框架所呈現出的基本意義層面可以歸納為：強震肆虐中國，帶來毀滅性破壞；中國人習慣性地依靠政府，是長期政治訓練的結果，同時，也有一些中國人並非消極地等待，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期待政府的救援；救援工作積極而艱難，相對活躍的信息流動和最高領導層的快速反應與中國在唐山地震中的表現完全不同，也與緬甸處理氣旋災難完全不同，同時，中國聲勢浩大的救災行動表明，中國仍基本是政府主導和控制的社會；中國地震期間的開放和積極有效救災是為即將召開的奧運會營造良好氛圍、緩和國際關係的臨時策略；地震災害是社會主義制度終結的意象，中國領導人清晰地把他們救災的努力與政權的穩固聯繫到一起，並已意識到開放和責任可以加強它的正當性並澆滅腐敗、通貨膨脹和貧富懸殊所激起的日益強烈的憤怒；一個短暫的開放和負責並不意味着中國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發展，而溫家寶等領導人親臨災區指導救災、親民愛民的舉動像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家；中國政府在地震初期對新聞報導的開放姿態令人吃驚，但中國面對媒體的信息開放不是持久的而是前鬆後緊，三天全國哀悼日的最後一天，中國退回形象控制狀態，轉向了更加正面的報導。

中國面子(形象)被貶抑的話語邏輯

顯然，西方既存的對中國的偏見致使話語框架形成消極意義的偏向，這個話語框架又進一步維繫着既存的偏見，貶抑着中國的面子(形象)。從新聞專業主義角度看問題的人會為此進行辯護，認為西方的新聞話語生產在這裏遵循的是「看門狗」(watchdog)原則，而「看門狗」總是從揭示問題的角度建構新聞話語的，不能把它看作是對外群體的不友好。《衛報》駐京首席記者華衷(Jonathan Watts)在接受訪談時便說：

「媒體有很多功能，而我們覺得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做一個，『看門狗』，努力發現社會中出現的錯誤，顯示這些錯誤，並希望有人能改變它」，因此，「當我寫報導時，我不是來寫遊記的，不是來說中國有多美好的。當我們寫報導時，我們往往會去講問題。我們更多的時候會寫到中國的社會問題、環境問題，還有很多我們認為社會應該關注、應該改變的問題」。⁴²的確，如果把揭示問題本身看作偏見，那也只能是着眼於衝突、異常、負面、消極的「新聞的偏見」。從群體間交往的角度來考慮，偏見的產生其實並不在於新聞報導了甚麼問題，有多少正面或負面的新聞，而在於用甚麼話語來表達新聞，是否用刻板印象主導新聞話語。比如，「中國面對媒體的信息開放不是持久的而是前鬆後緊」，我們不能因其負面意義就判斷其中有偏見，而是要觀察整個話語是否由刻板印象所主導。

根據前面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傳媒話語框架的一個總體特點：報導汶川地震所帶來的毀滅性破壞，以及在信息公開背景下救災工作所顯示的變與不變的社會現象和政治現象，並把這一切納入西方話語體系來表述，作為正面肯定的變化大多用「馴化」的原則來報導，而作為負面否定的不變則用「異端」的原則加以評述。這樣，整個話語結構依然免不了落入西方式的偏見——一種西方的東方主義話語遺產。

所謂「馴化」(Cohen, Levy, Roeh & Gurevitch, 1996)的原則，便是用西方的認知框架把難以認知的中國事件轉換為意義載體，在中國的客觀現實與西方的主觀現實之間取得平衡(Berger & Luckmann, 1967)。比較典型的話語就是：一個短暫的開放和負責並不意味着中國在朝向西方式的民主發展，而溫家寶等領導人親臨災區指導救災、親民愛民的舉動像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家。新聞話語順着這種邏輯，便是以西方人所認定的面子(形象)來界定作為他者的中國。

所謂「異端」(Sphere of Deviance)的原則，就是把中國視為西方社會的一個邪惡的「他者」、視為相異於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某種異端的報導策略，即完全不同於專業主義的報導策略——嚴格的客觀平衡報導，而是以較大的主觀性進行批判性報導，包括選擇符合某種意識需要的側面進行報導(Hallin, 1986: 117; 哈吉特、趙月枝, 2005: 117)，

甚至使負面報導中國成為一種「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比較典型的話語就是：地震災害是社會主義制度終結的意象，中國領導人清晰地把他們救災的努力與政權的穩固聯繫到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新聞話語已經完全為刻板印象所主導，只能形成對他者面子(形象)的貶抑了。

西方記者往往以新聞的「看門狗」角色來掩飾可能存在的偏見，華衷在接受筆者訪問時則毫不諱言他作為西方記者的偏見：

可以肯定的是，我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背景也一定會塑造我對中國的看法。我個人並不認為記者是客觀的、中立的。我們都有我們的感情、背景和偏見，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偏見，我們必須努力做到公正，給雙方同樣的機會出現在報導中。而事實是，我們是有感覺的人。當事情發生的時候，我們會有自己的感覺，這種感覺會部分地影響我們的報導，雖然它不會改變整個報導，但是它確實是影響的一個因素。正是因為這一點，我們對中國的認識總是不夠真實。⁴³

在涉及跨文化新聞報導時，西方記者的偏見常常表現為在沒有獲得全面、準確的信息的情況下，依據西方的認知框架和意識形態對他文化做出判斷，進而由此形成對他文化的扭曲性看法。心理學依據認知是否歪曲和態度是否公正把偏見劃分為兩種類型：一是認知或認識偏見(cognitive or epistemic prejudice)，即社會知覺不符合社會現實；一種是道德偏見(moral prejudice)，即社會知覺或態度偏離不同文化與群體間相互理解、溝通所需要的平等和公正原則(李淑臻，2007：6-7)。從西方媒體的地震報導過程來看，這兩種偏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西方記者的認知偏見主要由文化偏見與文化不適應、注重衝突性與對抗性的新聞價值觀所引起，比如不能理解中國災民的集體主義文化語境下的表述——「我們將依靠政府」，通過主觀推論，把它解釋為「依賴共產黨的政治訓練的結果」。而由於信息不對稱或信息不透明，西方媒體對於那些尚未信息公開的領域則進行了「充分」的猜測，並着眼於衝突性與對抗性的表現。《衛報》在5月16日的報導中根據溫家寶

總理對着電話向軍方生氣怒吼的信息猜測，政府高層在救災方針上存在不和。⁴⁴《紐約時報》5月21日的報導也猜測，「中國的宣傳機器似乎在周二(5月20日)重新實施了對國有新聞媒體的控制」。⁴⁵猜測的導因是5月20日的中國媒體一致採用了嚴肅、黑白的頁面並刊發不斷重複的話語「中國，加油！」。根據現代心理學的理论，當面對不明確的信息的時候，人們會傾向於用與偏見相一致的方式作出反應，即便他們有意識地拒絕偏見(Devine, 1989)。相應地，當西方記者面對中國的不明確的信息的時候，特別是信息處於被封鎖的狀態的時候，他們更可能依照自己的偏見來進行報導。因此，信息封鎖只能促進偏見的滋生和膨脹，越是封鎖負面事件的信息，西方的報導就越是捕風捉影來強化他們的偏見。在缺乏全面、透明的信息的時候，任何人包括我們自己都難以擺脫受偏見束縛的心理機制。

西方記者的認知偏見往往還表現為以西方的意識形態為「透鏡」來看中國的事件，呈現二元對立的思維：西方是自由、民主的，中國是封閉、專制的，並以此形成外部群體和內部群體的劃分，簡化對事物的多樣性、複雜性的認識。這一點往往在對事實進行演繹歸納的時候顯得比較突出。按照佩蒂格魯(Pettigrew, 1979)歸因理論的解釋，人們如果認為一個人的行為是負面的，當這個人是外部群體的成員的時候，人們傾向於將其行為解釋為意願性的(內在的)原因所致；而當這個人是內部群體的成員的時候，人們會將其行為解釋為條件性的(外在的)因素所致。同樣地，當行為人是外部群體成員的時候，其正面行為將會被歸因於條件因素；當行為人是群體內部成員的時候則被歸因於意願性原因。中國作為西方世界的「外部群體」，政府積極救災的正面形象被西方媒介歸因為條件因素，即中國政府並不是真心要救助災民，而是迫於政治形勢不得不這樣。

當西方記者進入由意識形態所造成的認知偏見時，他們對中國問題的感知或態度就開始偏離平等和公正原則，進入道德偏見的層面。其具體表現在於：偏離客觀報導和揭示問題的過程，出於支配他者、意識形態霸權、種族歧視等目的製造片面性報導，如，在報導自己國家的災難事件時，西方記者往往重點批評政府的救援工作遲緩，而看到中國的救援工作快速展開，西方記者則滿懷政治道德優越感評論「中

國仍基本是政府主導和控制的社會」，中國人民主素養缺乏，只能依賴政府；當這種道德優越感發展成一種政治敵意的時候，又出現排斥他者、異端的表述，產生出前面所列的《芝加哥論壇報》的想像式話語：汶川地震是對中國政治基礎的震動，設想古代迷信的中國人會問，「這些驚人的災難，特別是一場可能造成五萬人死亡的地震，是否可能昭示著共產黨（政權）失去了古代中國所稱的『天命』——更高權力的政治授權」。

偏見的要義在於在沒有獲得全面、準確的信息的基礎上對他文化做出的不理性的判斷。新聞記者不能獲得全面、準確的信息，不外兩大原因，一是信息不明確或信息被「屏蔽」，不能充分接近並感知信息源；一是由於記者自己深陷於政治經濟利益與文化衝突之中，從而以單一價值觀選擇、組合信息，「過濾」掉其它信息。前一個原因表明，新聞封鎖只能加深西方媒體報導中的偏見，英國《衛報》駐華記者華衷認為，「封鎖」的政策確實對於西方媒體的中國報導有負面的影響，記者將很難瞭解一個新聞的兩面，封鎖本身也將成為新聞。⁴⁶ 後一個原因顯現偏見之可怕並不在於信息不準確或認知的局限，而在於由於人性的弱點，記者參與建構並維持符合某種群體利益的權力支配體系。一些西方記者的道德偏見說明，西方對於中國的權力支配關係是高於對事實的全面感知的。如果在報導中僅僅只有認知偏見，並且像華衷那樣承認存在偏見，那麼，通過信息交流和文化對話，還有可能獲得認識真相的多元路徑。但是，道德偏見只生產敵意和憤怒，大大降低了信息交流和文化對話的可能性。

中國主流媒體選擇性解碼背後的面子協商

面對西方傳媒的偏見，信息公開、多元交流、平等對話的確是上策，因為這樣做既可能把偏見消滅於無形，又可能在偏見中認識他者、砥礪自我。但是，如果我們一廂情願地要求西方媒介也要「正面報導為主」，否則便斥之為偏見或者「妖魔化」，那麼我們自己便已深陷偏見之中了。出人意料的是，西方傳媒的汶川地震報導對中國主流媒體產生了另類的「影響力」：從5月13日到6月16日，各大媒體無一例外

地正面轉述或者評價西方媒體的汶川地震報導，其中，《紐約時報》、《泰晤士報》、《衛報》、《芝加哥論壇報》分別被引述8次、6次、4次及2次。這些引述給人總體印象是，中國主流媒體在選擇性地解讀他者的話語中維護着群體的面子，進行着中西方之間的「面子協商」(face-negotiation)。那麼，在話語解讀和面子關切層面，這表現了怎樣的問題呢？

從新聞標題來看，在對西方四家傳媒話語的概括上都使用了具有積極意義的抽象語言，如感動世界、積極評價、高度關注、反應快速、令世界刮目、前所未有的開放姿態、空前透明、不辱使命、重寫新生活、越來越成功、彰顯自信中國形象。所有語言都偏向積極層面，把西方傳媒的話語重組成新的話語，表現出單向性的話語重構：突出或放大他者對「我們」的行為的積極表述，模糊或遮蔽他者對「我們」的行為的消極表述，從而形成維護內群體形象的話語與他者話語的競爭關係。

在引述西方傳媒話語時，中國主流媒體一概剝離具體的語境、上下文結構、文化價值、意識形態，以斷裂式引述和概括式引述把西方傳媒話語重組到自我群體價值導向的話語之中：

美國《芝加哥論壇報》報導說，在中國全力應對最新發生的自然災害時，「我們看到一個過去20多年來高度開放社會的高速運轉」，並且還看到「中國領導人展現出的與外界接觸的新面孔」

(新華每日電訊，2008年6月2日)

「相當充分的信息披露和高級官員的快速反應，與中國當年應對唐山大地震有巨大的不同。」美國《紐約時報》13日這樣評論。

(新華每日電訊，2008年5月14日)

《紐約時報》用「鋪天蓋地」形容新華社的報導，其評論稱，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其中英文網站上大量報導此次地震災難，定期更新災情報導，其中包括最新傷亡數字。

(人民日報，2008年6月2日)

英國《泰晤士報》14日發表文章，高度評價了中國政府的救災工作

和對地震災難信息所持的開放態度，相信中國有能力和經驗應對這場災難。
(新華社2008年5月15日)

顯然，傳統的對外宣傳思路「過濾」了新聞引述，從而使西方新聞報導的意義發生根本性變化。把上述現象做一歸納，便是用西方意識形態編碼的訊息被以中國意識形態的符碼加以解碼，暗合了艾柯(Eco, 1980)所說的自行解碼(aberrant decoding)，製造了西方傳媒正面報導中國的幻象。這種解碼方式使斯圖爾特·霍爾(Hall, 1999: 508)所說的「協商式解讀」(the negotiated reading)和「反抗式解讀」(the oppositional reading)混合在一起，即在西方媒體有正面報導的元素包含在文本內的時候，承認其文本的合法性，但通過調整使解讀適應自己的特殊社會需要，進而形成了與西方媒介文本的意識形態符碼完全相反的解讀，甚至連詞語都轉譯成中國式的話語。這就導致了一種悖論：本來想借助他者的話語建構認同的力量，關切自我面子(形象)，但是，由於抽去了語境，他者的話語所顯現的正面意義到頭來是一種虛假的意義，所謂他者的認同只是一種真實的幻覺。

在群體間話語互動之中，人們常常試圖利用他者話語建構自我認同，這是合理的事情，因為認同(identity)的建構總是與他者的獨特理解和認知相聯繫的，離開他者的理解和認知，自我認同就變成了自言自語，失去了意義。但是，完全用自行解碼的方式來解讀他者的話語，又會使認同變得虛幻起來，跨文化的面子協商便進入荒謬境地。

根據丁允珠(Ting-Toomey, 1988)的「面子協商」理論，中國人所講究的積極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給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人們生活在群體當中，有被接納被保護被包容的要求；「給面子」是鼓勵、支持並滿足人們對被包容被接納被承認的需求。這種群體價值導向的文化處理衝突的策略一般是謀求「群體包容」，也就是通過不斷的「給面子」，來滿足人們的「要面子」，從而化解衝突。這種面子協商策略在中國文化群體內是有效的，一旦轉移到與他者的跨文化面子協商，由於文化的差異，不能分享面子的意義，就無法在面子問題上溝通了。無論是感覺受到了西方媒體的傷害，還是選擇性收集西方媒體的正面話語，這種謀求他者包容的「要面子」心理很難得到

西方人的理解。這樣做的結果讓人啼笑皆非，似乎西方媒體一反常態，學會了中國人的面子協商策略，用「要面子」、「給面子」的方式化解文化衝突。

其實，要想進入與他者的面子協商，只有去弄懂他者的面子，也就是說，要想在西方新聞話語裏建構自我的形象，還必須懂得西方式的面子協商方式——追求所謂消極面子，謀求「個體自治」，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間，避免他人侵害個人的獨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現出對他人自由、空間和某種孤僻的尊重。其處理衝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決問題式的，或者通過競爭，謀求獨斷權威。它暗含的邏輯是，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訂立契約；或者訂立基本遊戲規則，按照規則競爭；只要是按照規則競爭的，無論輸贏，都有面子。因此，中國要想在西方新聞話語裏找到面子，最有效的方式應該是，以西方的公平、正義、平等競爭規則和新聞專業主義媒介規則來解讀其關於中國的新聞報導，不是尋找西方讚許或批評了甚麼，而是體驗西方的話語由甚麼東西所主導，在怎樣的語境中構成，發現其中的矛盾與問題，通過實現西方式的消極面子，來得到中國式的積極面子。

如前所述，「面子協商」理論存在簡化東西文化、強化群體價值導向和個人價值導向的二元對立、忽視交往語境的缺陷，這樣就難以動態地、全面地理解多樣化的面子協商。其實，面子協商是在關係中展開的，隨着面子觀的相互交叉和相互借用，自我認同會發生多樣性的變化，某些變化會形成新的面子和主體間的共同面子。中國媒體的選擇性解碼通過突出或放大西方媒體對「我們」的行為的積極表述，模糊或遮蔽西方媒體對「我們」的行為的消極表述，從而形成維護內群體形象的話語與他者話語的競爭關係，表現出用西方話語對抗西方的宣傳策略，與批評西方媒體歪曲報導中國一樣，呈現了抗拒性認同(resistance identity)，即表達對排斥中國的西方話語的排斥，從而維護自我形象，加強自我認同。與此同時，它還顯示了另一種意義：它生產意識形態認同的同時，也內涵對於信息公開、開放社會的認同，預示出對於制度創新的合法性認同(legitimizing identity)；在重點引述的「公開透明」、「開放態度」等詞語背後，隱含着規劃性認同(project

identity)，即對政治文明轉型的規劃。⁴⁷ 這便是在中西文化交往中產生的新面子，也是中西方之間的面子。中國媒體一旦認同這樣的新面子和共同面子，就意味着要以開放的態度面對西方媒體的報導，多側面、多角度、立體地引述西方媒體的報導，把這些報導作為一面鏡子，審視自我，同時又清晰地呈現被刻板印象所主導的話語，這樣就有可能挽回面子，讓那些從事扭曲性報導的西方記者失去面子。

相比較而言，網民對西方報導的反應比中國主流媒體要清醒一些。筆者對強國論壇(5月13日到6月13日)進行不完全搜索，發現談論西方傳媒汶川地震報導的帖子共49條，這些帖子表達了多樣的觀點(考慮到有些帖子可能被刪除，觀點應該更加多樣)。其話語類型包括：

警醒式：「不要誇大並陶醉於西方媒體的『好話』。」

懷疑式：「人家一兩句中聽的話就讓我們一些人感到很爽。我根本就不信西方媒體那有色眼鏡這麼容易摘下，除非它不是西方媒體」；

反省式：「央視每每都要引用西方媒體評論來肯定我國人民的成績，是一種不自信的不負責任的表現」。

然而，這裏依然缺少的是對西方式面子的理解。只有自我面子關切而無他者面子關切，「我的面子」就只能是一種自我慰藉、自我封閉的產物，國民的文化心靈就呈現出脆弱、敏感的一面，無力解構讓人喘不過氣來的中西方的權力支配關係。

結語：在文化開放的語境中建構自我形象

根據本文的論證，人們在表述外群體時，總是習慣於把對外群體行為的理解納入自己的話語框架，在積極與消極意義上都形成了由刻板印象所主導的理解。無疑，這是群體間交往的障礙，亦是開放社會面臨的挑戰。西方人倡導平等、自由、博愛幾百年，依然擺脫不了西方式的偏見，深受種族主義、東方主義話語等偏見的困擾，主要原因在於，西方的權力與利益遮蔽了開放的心靈，現代性強化了西方與東

方之間的權力支配關係。中國開始走向信息開放，也始終把西方作為一個參照系，但與此相應的心靈開放還沒有真正形成。中國媒體對西方新聞的選擇性解讀要麼排斥消極報導，要麼回避消極報導，把西方新聞話語置換為單一的積極話語，最終落入封閉的話語體系，讓他者話語服從於中國的心情，既看不清他者，也不能由他者反觀自我，這樣就斷裂了中西方的交往關係，回到了封閉的自我。

按照本文的論述，群體間交往是一個社會性的互動過程，群體間話語偏見所呈現的消極意義和積極意義不是由語言和話語界定的，而是在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的過程中生產的，或者說是在群體間的「面子協商」中流動的。這就是說，面子總是在關係中建構的，維護自我形象和尋求他者認同必須在關係中進行，必須感知他者話語的具體語境、上下文結構、文化價值、意識形態，這一方面可以解構由刻板印象所主導的話語，另一方面又可以在文化開放的語境中認知自我，建構自我形象。

政府信息公開、媒體自由報導是中國開放自我、創新自我認同的重要條件，也為西方媒體展現了一個相對明確、豐富的信息環境，從而形成了減少偏見的可能性。但是，由於人性的弱點和權力的博弈，偏見將自始至終伴隨人類，中國人能做而又應該做的是，與差異同行，坦然面對偏見，把西方人的偏見當作是自我創新、超越自我的激勵，而政府和媒體又通過全面、公開的信息傳播，增加中西方民衆間的頻繁接觸與瞭解，努力消解偏見，在理解與溝通中讓人類恢復自己的道德力量，這樣才能建構處在交往過程中的中國面子(形象)。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西方傳媒的社會控制研究」(04JJD860002)研究成果，感謝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肖小穗副教授給予本文的重要啓發。

參考文獻

- 李淑臻(2007)。《偏見》。北京：東方出版中心。
- 哈吉特、趙月枝(2005)。《維繫民主？：西方政治與新聞客觀性》(沈薈、周雨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 Allport, G. W. (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 Berger, P. L., & T. Luckmann (196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A Treatise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P.
- Cohen, A. A., Levy, M. R., Roeh, I., & Gurevitch, M. (Eds.). (1996). *Global Newsrooms, Local Audiences: A Study of the Eurovision News Exchange*. London: J. Libbey.
- Devine, P. G. (1989). Stereotypes and prejudice: Their automatic and controlled compon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6 (1), 5–18.
- Devine, P. G., & Elliot, A. J. (1995). Are racial stereotypes really fading? The Princeton trilogy revisited.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1, 1139–1150.
- Eco, U. (1980). Towards a semiotic enquiry into the television message. In Corner and Hawthorn (Eds.), *Communication studies: An introductory reader* (pp. 131–150). London: Edward Arnold.
- Gitlin, T. (1980).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Mass media in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New Lef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ffman, E.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Gorham, Bradley W. (2006). News Media's Relationship With Stereotyping: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in Response to Crime New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March (56), 289–308.
- Hall, Stuart (1999). Encoding, Decoding. In Simon During (Ed.), *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 (pp. 507–517). London: Routledge.
- Hallin, D. C. (1986).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ass, A., Salvi, D., Arcuri, A., & Semin, G. (1989). Language use in intergroup contexts: The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7, 981–993.
- Maass, A., Ceccarelli, R., & Rudin, S. (1996). Linguistic intergroup bias: Evidence for an in-group-protective motiv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1, 512–526.
- Pettigrew, Thomas F. (1979). The ultimate attribution error: Extending Allport's cognitive analysis of prejudic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5, 461–476.
- Semin, G. R., & Fiedler, K. (1988). The cognitive functions of linguistic categories in describing persons: Social cognition and languag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4, 558–568.
- Ting-Toomey, S. (1988). Intercultural Conflict Styles: A Face-Negotiation Theory. In Young Yun Kim and William Gudykunst (Eds.). *Theories in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pp. 213–237). Newbury Park, Calif.: Sage.
- Ting-Toomey, S., & Chung, L.C. (2005). *Understanding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注釋

1. Jenkins, Simon (2008, May 14). As Burma dies, our macho invaders sit on their hands. *The Guardian*, p. 29.
2. Jenkins, Simon (2008, May 21). The world and its media are playing the dictators' game: Heroic Chinese rescuers and quake survivors lead the news. *The Guardian*, p. 35.
3. Jacques, Martin (2008, June 11). As China's power grows, the diaspora starts to flex its worldwide muscle. *The Guardian*, p. 31.
4. Branigan, Tania and agencies (2008, May 13). Thousands die in China quake. *The Guardian*, p. 1.
5. Magnier, Mark & Barbara Demick (2008, May 13). Quake ravages China: Thousands killed, children trapped as buildings tumble. *Chicago Tribune*, p. 1.
6. Ang, Audra (2008, May 28). Chinese flee threat of floods: Looming rainy season adds to risk in quake's wake, prompting evacuations. *Chicago Tribune*, p. 12.
7. MacArtney, Jane & Sophie Yu (2008, May 17). March of death leaves its scars as countryside becomes a giant grave. *The Times*, p. 41.
8. Osnos, Evan (2008, May 15). Scrambling for refuge amid ruins—Clothes, medicine, food go short as China strains to cope with a flood of earthquake survivors. *Chicago Tribune*, p. 1.
9. Branigan, Tania (2008, May 22). Survivors look to rebuild their homes and lives. *The Guardian*, p. 28.
10. Hooker, Jake & Jim Yardley (2008, May 13). Powerful Quake Ravages China, Killing Thousands. *New York Times*, p. A.1.
11. MacAskill, Ewen (2008, May 13). Bush offers to share spy satellite data as Europe stands by with aid. *The Guardian*, p. 4.
12. Branigan, Tania (2008, May 13). Surrounded by death, survivors fear more shocks: Beijing mobilises 8,000 troops as rescue effort intensifies. *The Guardian*, p. 4.
13. Times (2008, May 14). Seismic Shift: China responds to disaster with compassion, Burma remains criminally negligent. *The Times*, p. 16.
14. Campbell, Duncan & Agencies (2008, May 14). Authorities coping with disaster without need for outside help. *The Guardian*, p. 2.
15.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13). Olympic pressure helps to foster a caring response. *The Times*, p. 7.
16. French, Howard W. & Edward Wong (2008, May 16). In Departure, China Invites Outside Help. *New York Times*, p. A1.
17. Magnier, Mark & Barbara Demick (2008, May 13). Quake ravages China: Thousands killed, children trapped as buildings tumble. *Chicago Tribune*, p. 1.
18. Osnos, Evan (2008, May 18). A jolt to China's bedrock. *Chicago Tribune*, p. 13.

19. Branigan, Tania (2008, May 14). Desperate rescue effort at bank that dissolved into ground like a slab of melting butter. *The Guardian*, p. 2. 原文：The couple had little water and not much food, they said. They also had nothing but praise for the rescue effort.
20. Lee, Don (2008, May 24). China orders cities to give aid: Wealthier provinces to help quake victims. *Chicago Tribune*, p. 15.
21. Jacobs, Andrew (2008, May 14).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New York Times*, p. A1.
22. Jacobs, Andrew (2008, May 21). In Quake, Apotheosis of Premier “Grandpa”. *New York Times*, p. A6.
23.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 46.
24. Jacobs, Andrew (2008, May 14).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New York Times*, p. A1.
25.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 46.
26. Yu, Sophie (2008, May 19). In sleek cars and “I love China” T-shirts, a new people’s army pours out to help victims of the quake. *The Times*, p. 33.
27. Yardley, Jim & David Barboza (2008, May 20). Many Hands, Not Held by China, Aid in Quake. *New York Times*, p. A1.
28. Watts, Jonathan (2008, June 10). Tragedy brings new mood of unity: Government wins praise for reaction as the young lead surge in patriotic sentiment. *The Guardian*, p. 15.
29.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13). Olympic pressure helps to foster a caring response. *The Times*, p. 7.
30. Jacobs, Andrew (2008, May 14). Quake Toll Rises: China Struggles to Reach Victims. *New York Times*, p. A1.
31. Borger, Julian (2008, May 17). Beijing open to foreign aid and scrutiny in wake of tragedy. *The Guardian*, p. 26.
32.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 46.
33.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6). A seismic shift in China’s relations with West. *The Times*, p. 2.
34. Macartney, Jane (2008, May 24). Can the new, open China outlive the huge relief effort. *The Times*, p. 46.
35. Watts, Jonathan (2008, May 24). Quake patients face transfer as hospitals struggle to cope. *The Guardian*, p. 22.
36. Foreman, William & Anita Chang (2008, May 22). China in image-control mode: Reins in reporting, vows rebuilding funds. *Chicago Tribune*, p. 20.
37. Guan, Han (2008, June 4). Chinese quake outcry silenced. *Chicago Tribune*, p. 15.
38. French, Howard W. (2008, May 21). Rescues Continue in China, but Focus Is

- Shifting to the 5 Million Left Homeless. *New York Times*, p. A16.
39. Jacobs, Andrew (2008, June 2). Parents of Quake Victims Protest at Ruined Schools. *New York Times*, p. A9.
 40. Watts, Jonathan (2008, June 10). Tragedy brings new mood of unity: Government wins praise for reaction as the young lead surge in patriotic sentiment. *The Guardian*, p. 15.
 41. Watts, Jonathan (2008, June 13). Chinese media blocked as parents seek justice over collapsed schools. *The Guardian*, p. 26.
 42. 華衷 (Jonathan Watts) 在武漢大學的演講：一個外國記者如何報導中國，2008年4月2日。
 43. 華衷 (Jonathan Watts) 給作者的電子郵件，2008年7月29日。
 44. Watts, Jonathan (2008, May 16). Government appeals for rescue equipment as time runs out to find China quake survivors. *The Guardian*, p. 21.
 45. French, Howard W. (2008, May 21). Rescues Continue in China, but Focus Is Shifting to the 5 Million Left Homeless. *New York Times*, p. A16.
 46. 華衷 (Jonathan Watts) 給作者的電子郵件，2008年7月29日。
 47. 關於這三種認同的概念可參見：(美)曼紐爾·卡斯特(2006)。《認同的力量》(第二版)(曹榮湘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6-7頁。本文做了重新解讀。